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诺斯、张宇燕、阿西莫格鲁观点比较分析

陈本昌

(辽宁大学, 辽宁 沈阳 110136)

摘要: 本文通过对道格拉斯·诺斯, 张宇燕, 德隆·阿西莫格鲁的三本著作《暴力与社会秩序》《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概要性总结描述, 通过三人对制度的定义, 制度的功能, 制度在一国兴衰中关键作用几个方面的不同阐述以及他们关于制度作为一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和动力。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道格拉斯·诺斯; 张宇燕; 德隆·阿西莫格鲁; 制度经济学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二战后独立的 100 多个民族国家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到本世纪初只有 13 个经济体成为了高收入国家, 大部分国家都深陷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曾经取得了一段时期的发展,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又深陷停滞或衰退之中, 为什么从发展中国家跨入到发达国家是如此之艰难? 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很难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本文主要选取三位知名作者的主要观点进行对比分析来阐述制度经济学关于国家发展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他们是道格拉斯·诺斯, 张宇燕和德龙·阿西莫格鲁。我将主要从各位作者对制度的定义, 制度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制度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发展困境之谜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制度的定义

诺斯在 1990 年代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制度做的定义是“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 或者更规范的说, 它是一些人为设计的, 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①

张宇燕在最近再版的一本著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观点, 关于制度的定义张宇燕在总结前人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制度进行了定义。“制度的本质内涵不外乎两项, 即规则和习惯, 而其他特征或属性或附带说明均不过是它们的派生物。”^②“从外延方面看制度的要素主要包括所有权关系、经济决策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协调方式。他们三项又常常被统称为经济体制。”^③即制度的内涵是规则和习惯, 通过经济体制的外延表

作者简介: 陈本昌, 男, 1973 年生, 辽宁灯塔人, 经济学博士,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美国丹佛大学科贝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 常年从事世界经济教学及科研活动, 学术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南亚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

^①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格致出版社, 2014 年版, 3 页。

^②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87 页。

^③ 同上, 92 页。

现出来。

德隆·阿西莫格鲁没有给制度下一个正式的定义，或许是他基本承认了前人对制度的定义，因此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的两个概念，用这两个概念来分析国家兴衰的原因。并进一步将包容性制度分为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制度分为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创造包容市场，不仅给人民追求最适合他们才能的职业自由，而且还给他们这样做的平等舞台。有好想法的人可以开公司，工人可以选择生产率更高的活动，低效率的企业会被高效率的企业取代。”^①“汲取性经济制度的设计，从根本上是为了从社会一部分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财富，让另一部分人受益。”^②“汲取性经济制度由少数人建立，从多数人那里攫取资源却无法保护产权或者刺激经济活动”^③“我们把足够集权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作包容性政治制度。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不满足，我们就把这种制度称作汲取性政治制度。”^④并且他指出，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相互支持的，汲取性经济制度跟汲取性政治制度是协同联系的。

诺斯和张宇燕关于制度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都强调制度是一种人为的规则或习惯，都指出了制度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约束，阿西莫格鲁虽然没有给制度下具体的定义但从其对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描述中我们也能看出他也是完全同意制度是一种人为的规则或习惯这样的说法的。德隆·阿西莫格鲁的“汲取性制度”和诺斯的“权力限制秩序”表达的意义更相近。“包容性制度”与“权力开放秩序”更相近。

二、关于制度的功能与作用

在制度的功能与作用方面。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制度是约束人们的行为，提供人与人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⑤另一本著作《暴力与社会秩序》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限制暴力。

“现代权利开放社会一般是通过制度来限制暴力的。制度设计出规则，通过改变暴力行为的代价来直接制止暴力，最明显的，就是规范对暴力行为的惩罚。”同时诺斯强调了组织在在制度约束暴力中的关键作用，“为了使一项制度能约束暴力，特别是发生在互不认识的人之间的暴力，一些组织必须发展起来，这些组织中的官员必须非人际关系化的实施规则。换言之，只有存在着有能力在非人际关系化的基础上实施规则的组织，正式制度才能控制暴力。”^⑥

张宇燕关于制度的功能指出“制度之所以被人为地选择或创造出来，恰恰是由于它（们）具有满足人民——既可能是个人又可能是集团——的需要的功能。不言而喻，制度是人工制品，可它一旦被创立，便似乎具有某种不以（至少一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换言之，制度好像会独立地对社会中的至少一部分人施加影响；或依据‘正’激励，或诉诸‘负’惩罚。人们是在既定制度下行为的。他的偏好及与此有关的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均受到制度的左右。而效率水平亦由此而

^① 德隆·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5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315页。

^④ 德隆·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56页。

^⑤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4页。

^⑥ 道格拉斯·诺斯，《暴力与社会秩序》，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20页。

被决定。”^①这里张宇燕特别强调了制度对人的激励和惩罚两方面作用，即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使人相应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他通过列举工费医疗人们倒掉葡萄糖注射液用瓶子装油的故事，以及沃德的“伊利亚”模型和“棘轮”模型来有力的论证了他的结论。张宇燕又构造了一个制度发挥作用的流程图，阐述了制度——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其中又特别强调了制度起作用过程中政府的独特作用。

德隆·阿西莫格鲁关于制度的功能，他也强调了制度的激励功能。“美国现在远比墨西哥或者秘鲁富得多，是由于其制度——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所形成的产业、个人或政治家们的激励方式。每个社会都是由国家和公民共同形成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制度推动的。经济制度形成经济激励：受教育的激励、储蓄和投资的激励创新并采用新技术的激励，等等。政治过程决定了人们生活中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下，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过程的如何运行。”^②在这里，德隆·阿西莫格鲁特别强调了制度对人的行为的激励作用，同时指出了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即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则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对人们有什么样的激励，同时也就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和成败。

三、制度在一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

制度在一国的兴衰成败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是三位作者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了当今世界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仍处于不发达状态，甚至贫穷状态。

诺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经历过三种社会秩序，一、觅食秩序，以狩猎者——采集者团体为特征的小型社会群体；二、权利限制秩序或称自然国家的社会，产生于第一次社会革命期间。在这个社会里，人际关系（认识的，了解的）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构成了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个人互动的平台。自然国家对个人创建组织进行限制。和第三种社会秩序权利开放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人际关系仍然重要，但没有人际关系的各式人等——通常称之为公民——在广阔的社会行为领域里互动，而无需确切地知道各自的身份。同时诺斯也认为，自然国家，而不是权利开放秩序，才是社会默认的结局。为什么大多数国家还是自然国家？诺斯的回答是权力秩序的国家的权力分配方式决定了这一切，即自然国家对暴力的控制的特征决定了自然国家的利益分配格局，同时也决定了对人们的激励，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程度。自然国家的逻辑是：“自然国家通过形成支配联盟来减少地方性暴力，支配联盟由拥有各种特权的成员组成。自然国家的逻辑源于其处理暴力问题的方式。精英——支配联盟——同意相互尊重特权，包括产权，以及获取资源、参与活动的权利。通过将这些权利限制在支配联盟的成员范围内，精英们知道暴力只会降低他们的租金，故而他们有不斗争的激励。这样，自然国家的政治系统就通过操纵经济系统来产生租金，来保证政治秩序的安全。”^③自然国家是稳定的，但不是静止的，没有一个支配联盟是永久的。社会所面临的意料之外的冲击和变化，会使支配联盟内部关系发生动摇。^④在自然国家支配联盟中的大部分关系是人际关系化的而不是非人际关系化的。因此，在自然国家就形

^①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158页。

^② 德隆·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29页。

^③ 道格拉斯·诺斯，《暴力与社会秩序》，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22页。

^④ 同上，26页。

成了保护人——客户网络这种普遍存在的非正式网络，精英利用这种网络来寻求租金最大化，非精英们则通过这样的保护网络来寻求精英的庇护，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保护人——客户网络不仅能架构设租、积累和分配，从而限制暴力，还能架构和组织暴力本身。^①根据自然国家内部支配联盟的稳定程度，和社会对暴力控制的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自然国家有可以分为脆弱的自然国家，初级的自然国家和成熟的自然国家，当今大多数国家都处在初级国家有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已进入成熟型自然国家（中国），要想实现从成熟型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型自然国家的转变，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是带有一些偶然性的事件。

张宇燕通过提出“适宜的制度”与“事与愿违的制度”来解释当今大多数国家之所以在发展上失败的原因，“所谓适宜的制度，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的均衡状态，在其下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既与他的预期相吻合，又同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并行不悖，亦即已经不存在通过改进制度来节约社会资源的机会了。该制度状态所对应的经济结果（如增长率、效率、稳定、公平等）相对于其他各种制度状态的对应物而言更优，可以被看作适宜制度的另一附加条件。”^②“事与愿违制度”指的就是适宜制度的对立面，张宇燕用“制度悖论”来解释“事与愿违的制度”。“制度悖论”指的是人们本着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所的选择的制度，导致了逐渐偏离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换言之，它指的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人的最优行为的结果并未与适宜的制度所对应的结果相吻合。具体讲，“制度悖论”是指两种情况，第一，在既定的制度下可能一方面存在着许多增进个人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却又难以使之成为现实；第二，制度一方面达到了均衡，但另一方面却又是“灾难性的”了解了“制度悖论”的概念，然而为什么会存在“制度悖论”？张宇燕通过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以来及累计效应；制度非中性（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东西是各异的；而那些已经或将从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必定会竭力维护或创立这种制度。制度给社会各部分成员带来的好处或损害是不对称的，即是一部分人受损一部分人受益，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对制度非中性有更深刻的阐述，他用布罗代尔钟罩来解释当代一些国家的分裂和贫困现象，他指出当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只是维护那些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对于那些贫穷的人们却很少赋予他们正式的产权，使穷人的财产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不能资本化，使穷人手里的财产成为僵化的资本，无法给他们带来资本增值的收益。）和利益集团；相对福利理论与非适宜的制度选择；“搭便车”与制度惯性；及合乎理性的无知；封闭系统与制度僵化等六个方面来解释了制度悖论的存在。正是由于“制度悖论”的存在，解释了国家衰败的原因。

德隆·阿西莫格鲁通过他的“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的理论架构分析了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原因。他说“国家在经济上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汲取性制度。这些制度使穷国一直贫穷，阻止它们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这些制度的基础是设计经济制度的精英阶层，他们为了使自己致富并保持权力长久不变，不惜牺牲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尽管存在着精英性质和汲取制度在细节上的差异，汲取性制度保持不变的原因通常与恶性循环有关，从使人民致贫的意义上说，这些制度的影响是相同的。”^③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创造了汲取性经济制度，把财富和权力转移给了精英。

^① 同上，47页。

^②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190页。

^③ 德隆·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296页。

阿西莫格鲁强调了恶性循环“寡头铁律”在一国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寡头铁律’是指在汲取性制度下寡头的内在逻辑就是掌权者可以再生，同一权力集团掌权时是这样，全新的权力集团接管时也是这样，实际上所有各阶层组织都是这样。”^①“汲取性政治制度几乎没有构成对权力行使的约束，因此推翻之前的独裁者并控制国家的那些人根本不受任何制度的限制，可以随便使用权力，滥用权力；汲取性经济制度意味着仅仅通过控制权力、征用他人财产和建立垄断就有大量的利润和财富可赚。”^②但阿西莫格鲁有强调“寡头铁律”并不是不可突破的，历史上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成功突破“寡头铁律”的例子。

在了解三位作者的主要观点之后，我对三位作者的一些相同或相近的或有差异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我们看三位作者的关键概念，在诺斯那里诺斯指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秩序：“权利限制秩序”“权利开放秩序”，并指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大部分国家还都处在“权利限制秩序”社会，即他称为“自然国家”；张宇燕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适宜的制度”与“事与愿违的制度”，人类社会经常出现的是“事与愿违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国家的衰败就成了必然的事情；德隆·阿西莫格鲁的两个重要概念是“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由于人类社会在“汲取性制度”下普遍存在的“寡头铁律”所以使一国处于内战、动乱状态就成为了历史的主要画面，这样的国家定然是失败的。对比一下三个人的关键概念，我们发现，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即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制度或称为好的制度和人民不希望看到的制度即坏的制度。好的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对人们和社会形成正的积极的激励，这样的社会经济就会繁荣，社会就会发展，人们的福利水平就会提高。而坏的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非对称的激励，或者说会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这样就会形成负的激励，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停滞，社会陷入动乱，人们生活流离失所，福利水平下降。

其次，三位作者对社会能否从贫穷落后向富裕繁荣转型，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这不是历史的一条必然规律。诺斯认为，“人们无法有意识地推动国家由脆弱的自然国家前进到初级的自然国家，再到成熟的自然国家。自然国家的动态变化来自于支配联盟的动态变化，支配联盟为应对不断变化的条件而频繁地在谈判和变动。如果调整带来的是更多的权力和租金在个人身份的基础之上，制度变得简单，组织的复杂程度降低，则社会将向脆弱的自然国家那一端靠近。而如果调整带来的是更多的权力建立在稳定的合约的基础之上，制度变得更复杂，组织也更为复杂了，则社会将成熟型的自然国家那一端迈进。国家向任何一端移动都没有一定之规。”^③这里指出了社会的发展比不必然的有自然国家进入到权利开放国家。更可能的情况是停留在自然国家。张宇燕通过“制度悖论”这一概念的阐释指出，“虽然某种制度的安排或制度创新确实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并且最终为个人福利提高奠定了基础、创造了积极而有利的条件，虽然人的本意从逻辑上讲也确实希望制度能够如此，但它们的出现常常视乎也只是一分幸运的巧合。要知道，人类的选择有时就是这么无济于事。”^④无异于再说，适宜制度的出现有时是人所不能及的或带有某种宿命和幸运的色彩。德隆·阿西莫格鲁在

^① 同上，269页。

^② 同上，273页。

^③ 道格拉斯·诺斯，《暴力与社会秩序》，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98页。

^④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211页。

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两种制度的转换中强调了,并不必然存在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变,往往是“寡头铁律”在起作用,一种汲取制度对另一种汲取制度的取代,有时还会出现包容性制度向汲取性制度的转变,他列举了历史上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变,威尼斯由繁荣转向萧条,这都说明了包容性制度的脆弱性和阿西莫格鲁又用“制度漂移”这一概念来解释一个国家形成汲取性制度或包容性制度是带有极大的偶然性的。

第三,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张宇燕都重视历史关键事件对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转变的巨大影响。张宇燕通过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事例,以及蝴蝶效应的故事说明了初始条件的重要性,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故事说明,虽然一开始为了组织农业灌溉活动需要异地的管理集团,这在一开始对全体成员也是有利的,但这是赋予管理集团的一些权力,在接下来的历史演变中却走向了有利于全体成员的反面,是管理集团的权力变成了特权,变成了社会走向专制的起点,他认为这是人们理性有限的一种体现,这也体现了初始条件的重要性,蝴蝶的故事也从一个普遍联系的角度提出了初始条件加上累积因果的作用决定了“制度悖论”的存在。

德隆·阿西莫格鲁在强调关键节点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强调细小差别的重要性,他指出,正是1346年的黑死病动摇了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启了西欧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变,而同样是受黑死病影响的东欧却没有出现这种转变,反而封建领主们变得更加集权了,他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东欧的领主们有更强的激励因素保持劳动力市场的汲取性,并使农民保持农奴身份。在英国这种动机也一直在起作用,不过,工人们有足够的力量,因而最终胜利了。但是在东欧,瘟疫之后领主们却接管了大片的土地,扩展了他们的财富,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和财富已经比西欧的领主们大得多。城镇越来越虚弱,人口越来越稀少,工人们开始看到,他们不但没有变得更自由,而且已经有的自由也收到了限制。导致后来在1600年时期东欧、西欧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都是当时工人权力的一些细小差别决定的。阿西莫格鲁有指出,这些差异在开始时通常很小,但他们会累积起来,创造出一种称作“制度漂移”的过程。这同张宇燕的初始条件加累积循环有异曲同工之妙。

诺斯相对于其他两人更强调一个社会能否向前发展取决于这个社会能否生成支撑更多、更复杂的组织的制度以更好的控制社会的暴力,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支配精英集团能发展出更复杂的制度,通过制度来更好的约束暴力,则这个社会就会向繁荣富裕的方向发展,如果权力精英集团使社会的制度变得更简单,使社会的组织都变成人际关系化的,用暴力来约束暴力则这个社会就会向动荡和落后转变。而这种转变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和必然。

第四,对于人类社会由贫穷不发达向富裕发达的转变的条件和路径三位作者表现出一定的分歧。

在诺斯、张宇燕和德隆·阿西莫格鲁的著作中虽然都认为人类社会有贫穷、动乱向繁荣稳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诺斯和德隆·阿西莫格鲁还是指出了这种转变的可能和条件。诺斯指出了由“权力限制秩序”向“权力开放秩序”转型的三个门阶条件:1.对精英的法治;2.公共或私人领域内的永久性组织;3.对军队的统一控制。在门阶条件上的国家也可能无法继续成功转型,或者可能再次退回到自然国家状态。他认为“只有当精英认识到将部分精英特权转换为精英成员共有的非人际关系化精英权利是对他们有利时,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就开始了。”^①但他也指出这个过程

^① 道格拉斯·诺斯,《暴力与社会秩序》,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254页。

并非是不可能的，意思是说这不是必然发生的，“面临不确定性和新形势的权力群体的自然倾向是巩固特权，而不是将特权范围扩大到更多精英。”^①“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是精英在支配联盟内部开放权利，通过制度变迁来保障权利开放，然后开始向更多公民扩大权利开放的过程。”^②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并不是不可达到，他指出英国、法国、美国在近代最先达到了转型的门槛条件，并通过制度和组织的发展，使统治精英们认识到了权力的开放对他们的好处，开启了社会由“权力限制秩序”向“权力开放秩序”的转型并取得了成功。总结诺斯的观点，可以归结为：转型的道路虽然艰难但不是不可达到。

德隆·阿西莫格鲁也认为由“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历史往往受制于“寡头铁律”的困扰，出现一个“汲取性制度”替代另一个“汲取性制度”的恶性循环。然而历史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无奈，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出现后，能够开启包容性制度的构建过程，如历史上的1688年的英国，1789年的法国和1868年的日本，都是从政治革命开始形成包容性政治制度的过程。对于如何开启授权过程德隆·阿西莫格鲁指出，开启赋权先要有一定程度的集权秩序，这样挑战现有机制的社会运动就不会造成法律秩序的缺失；还有多元主义的政治制度，广泛联盟能够形成并延续；公民社会机构使反抗运动不会被当权的精英阶层轻易地镇压，也不会不可避免地沦为另一个集团控制当前汲取性制度的工具。但他指出这其中的许多因素是历史注定的，并且只能缓慢的变化。他又指出媒体在授权过程也会起到转变性作用。媒体可以让社会广泛获得当权者的滥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信息，使社会获得广泛的权力。只有当广泛的社会成员为影响政治变革而动员组织起来的时候，并且这样做不是为了宗派原因或控制汲取性制度，而是为了把汲取性制度转变为包容性制度的时候，媒体的帮助才会转变为有意义的变化。这同诺斯的开启转型之路需要统治精英集团开启授权的过程的思路基本一致，只不过诺斯强调支配精英集团内部认识的提升，认识到权力的授予对他们自己有利，德隆·阿西莫格鲁强调整个社会意识水平的提升，在转型中的重要性。同时他也认为，能否开启这个赋权的过程、是否为进一步的授权打开大门并最终成为持久的政治改革，将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依赖于许多起作用的微小差别，依赖于非常偶然的歷史路径。这同张宇燕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及累积效应又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宇燕对于社会能否从贫穷不发达走向繁荣富裕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对于为什么有些国家所选择的制度相对就好些时，张宇燕认为除了承认人类通过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不懈努力可能会实现或趋近适宜制度之外，他某种程度上认为适宜制度的出现存在着一定的宿命和偶然及幸运的巧合。有时候人类的选择是无济于事的。张宇燕对一国能否从贫穷落后走向理想中的繁荣，是不持肯定意见的。在对制度之于国家的兴衰的作用进行分析之后，张宇燕似乎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当我们面临导致‘合理的浪费’的制度虽欲改变之却力不从心时，我们作为个人又应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也许让我困惑的还是，作为制度利益之结果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是否真的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可是除了努力指出或暗示出每个经济学家心目中的通向丰裕‘大同’世界的道路外，经济学家还能干什么呢？”他用罗素的话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始于迷惘，终于更高水平的迷惘。”

通过比较三人的基本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好的制度才是实现一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① 同上。

^② 同上。

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社会的发展源于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没有制度的发展和创新，就不可能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不可能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跨越。

参考文献

- [1]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4.
- [2]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3]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4]德龙·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 [5]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 [6]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7]庄巨忠.亚洲的贫困、收入差距与包容性增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Motiv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views of North Zhang Yuyan Acemoglu

Chen Ben-chang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survey three books by Douglass C North, Zhang Yuyan and Daron Acemoglu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and compare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three writers such as what is institution, what is the functions of institution and the cor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 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And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ir views of motiv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in order to find the methods and motivit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ross the middle-income trap.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ouglass C North; Zhang Yuyan; Daron Acemoglu; Institutional Economics